

中国第一次节育高潮及其历史评价

~~~~~ 孙 沐 寒 ~~~~~

在中国,虽然本世纪初就有人提出了节育主张,且有民间节育社团的出现,但始终未形成有力的节育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五年,实行的是限制避孕和堕胎的政策。1955年始,中国展开了节育活动,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节育高潮。这历时三年之久的节育活动,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它不是实行计划生育的起点,但它是一个序幕,是一个洪亮的前奏,对后来的计划生育有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 一、节育高潮的动因在于人口

#### 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压迫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国家忙于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还没有可能制定出人口政策,人口生育延续了建国前的放任状态。全国人口总数沿用了4.75亿的数字。这是国民党政府1931年根据1928年户口调查得到的数字。实际上,1949年已是54167万。由于没有人口静态和动态统计,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如何,是不清楚的。

两次人口调查,揭示了人口发展的真实状态。

1953年结合基层选举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意义上的人口静态调查。普查结果表明,1953年国内总人口已达5.9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4。其中农村人口占86.74%,城市人口占13.26%。

内务部主持的人口抽样调查,弄清了人口出生动态:1953年人口出生率为37%,死亡率为17%,自然增长率为20%,每年净增人口1200万以上。同前10年相比,人口生育已经出现了“高一低一高”的发展趋势。根

据马寅初先生的估计,1953~1957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恐怕要比1953年高,会超过20%。事实证明,他的估计是正确的,这4年每年净增人口1362万,自然增长率为22.21%。马寅初认为:“人口如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若每年还生出1300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sup>①</sup>。

其实,人口的潜在压力当时就显现出来了。1952年,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占有耕地只有3.29亩。此后每年新增农业劳力450万,每年至少开垦2925万亩耕地,五年开垦14652万亩耕地,才能保持3.29亩的均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预计开垦耕地只有3868万亩,远不适应新增农业劳力的需要。农业发展要被日益增加的农业劳动力所累。

城市人口就业,虽已有相当进展,但是,每年净增人口1200万。这庞大的人口资源,同就业所需要的岗位及装备费之间矛盾很大,假定按每年就业150万的最低数字计算(其余人口在农村就业),每个工人的装备费按1.3万元计算,每年也需要195亿元。由于积累水平较低,很难支付这笔巨大的装备费。这样,就业只能以降低劳动生产率来抵偿。这对发展生产是很不利的。

继续放任人口生育,经济的发展吃不消,人民生活也会受到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节育活动应运而生。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发展结伴而行。对节育活动的主观指导,正确地反映了这个客观规律。

<sup>①</sup> 《中国计划生育史稿》第74~95页,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

## 二、建国后，邓小平最先提出节育主张，刘少奇主持的节育座谈会是推行节育的起点

新中国建立后，节制生育的主张是谁提出来的？有很多说法。周恩来在中央八届二次全会上所作的《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说：“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sup>①</su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最先提出了节育主张，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

1953年8月，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的邓小平，指示卫生部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撤销查禁进口避孕药具的通知<sup>②</sup>。政务院于8月11日，批准卫生部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指示卫生部“帮助群众节育”。《办法》中说“国家提倡避孕，避孕方法可由人民自由采用，但不许做大的流产手术。”但是，由于卫生部没有改变限制节育的思想，这一办法拖延未发。1954年邓小平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的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sup>③</sup>。1954年7月20日卫生部正式发文实施。

邵力子先生是热心提倡节育的著名人士。他早在1922年便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过《生育节制释疑》的文章<sup>④</sup>，主张节育和节欲同时做起。建国后，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建议传播避孕理论，指导避孕方法，供应避孕物品<sup>⑤</sup>。同年12月，又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规劝青年男女订出生育计划，建议母亲们延长哺乳期以避孕<sup>⑥</sup>。他和其他有识之士较早的做了节育社会宣传，为中国节育活动的兴起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座谈会，并发表了讲话，表明了党和政府对节育问题的态度。这意味着从限制节育到提倡节育的转变。刘少奇立足于中国的实际，

系统地论述了节制生育的必要性，提出了推行节育的方法。他明确表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他指出：“中国不要搞母亲英雄”，“中国大概不会因为节育闹人口恐慌”。他分析了人口过多的后果，指出人口增加会发生许多困难，“例如北京的粮食、布匹、药品就都不够。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大负担，很多人也有困难。”关于节育的做法，刘少奇认为结扎输卵管要生过六个孩子，限额太高了，特别是有病的人，最好一个小孩也不要生；避孕药品与器具的供应，力求满足，自己生产不足，允许进口，也不禁止到香港去买<sup>⑦</sup>。

座谈会后，中央于1955年1月批转卫生部起草的节制生育报告，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sup>⑧</sup>这是中央正式发出的第一个关于节育问题的文件。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它预示着一个新的节育高潮即将到来。

## 三、中国的节育活动和外国不同，

### 它一开始便是由党和政府领导的

50年代前后，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不支持群众的节育要求，节育活动多是由民间人士或社团倡导和组织。除了认为避孕有伤风化，会引起性罪错外，主要是害怕干涉人权的批评。

① 《周恩来选集》第23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 《计划生育文件汇编》第3页，1987年。

③ 《中国人口年鉴》1986年，第28页。

④ 《中国节制生育论集》第66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

⑤ 《中国计划生育论集》第4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

⑥ 《中国计划生育论集》第243页，红旗出版社，

⑦ 《刘少奇文选》第171~17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⑧ 《计划生育文件汇编》第3页，1987年。

同国外不同,中国的节育活动一开始便是由党和政府公开发动和领导的。党中央改变了限制避孕和堕胎的政策,确定了适当节育的方针,为节育活动开辟了道路。国务院节育问题研究小组,多次对节育用具、药品的生产、销售、进口等做了一系列规定,为节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保证。在中央,主管节育指导工作的是卫生部。在地方,由各级卫生部门实施具体领导。有的省、市则建立了专门的节育工作委员会或节育领导小组。第二轻工业部、商业部、医药公司负责避孕药品生产和销售,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积极提倡晚婚和节育工作。这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节育活动便蓬勃展开了。

对避孕药具的生产积极地做了安排。由于生产跟不上,供不应求,1955年扩大了生产数量,按1000万人份安排生产,其中避孕药约占30%,保险套占55%,子宫帽占10%,油膏占5%。1956年又在1955年实际供应量的基础上,增加了生产,阴茎套销量比1955年增加250%,子宫帽增加100%,药增加60%。1957年避孕药具销售总额又比1956年增加500%,这一年全国生产阴茎套6500万只,子宫帽50万个,避孕药具195万只。北京市1957年第一季度共销售阴茎套51万多只,子宫帽5900多个,避孕药膏2.3万多只。

与此同时,节育宣传有限度地展开。除了不介绍具体的避孕方法外,报刊发表了不少宣传晚婚和节育的文字。《健康报》、《光明日报》、《中级医刊》先后发表避孕宣传的社论。《中国妇女》1955年到1958年上半年共发表25篇宣传节育的文章。上海、浙江、辽宁、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江西等省市都出版了一批避孕读物和挂图。据卫生部不完全统计,至1957年止,全国出版图书500多万册。各地举办报告会、座谈会、展览会,放节育电影、幻灯,传播避孕知识。1957年全国发行电影拷贝150部,幻灯片700多套。

北京市从1956年10月到1957年8月,听避孕报告和参观展览、看节育电影和幻灯片者83万人次,占全市成年人口的40%左右<sup>①</sup>。1957年,河北省利用举办避孕展览会、报告会、多子女父母座谈会等,吸引了600多万群众接受避孕知识宣传。

50年代的节育活动,主要是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展开的。城市医院都建立了节育指导门诊。上海市建立了159处节育门诊。农村开展节育活动的只有河北、山东等少数省。河北省1956~1957年,全省培训避孕知识宣传员23553名,建立避孕指导站1230处,避孕药具销售点3134处,38个市、县建立了节制生育委员会。据河间、故城、沧县等6个县统计,避孕率达到28%。当然,在中国庞大的育龄人群中,接受节育指导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因此效果并不显著。但是,广泛的社会舆论和自由使用避孕药具,对人口生育也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1955、1956两年同前几年相比,全国人口出生率出现了下降趋势:1954年出生率为37.97‰,1955年为32.60‰,1956年为31.90‰。在死亡率逐年下降的情况下,1955年的自然增长率比1954年降低4.47‰,1956年比1954年降低4.29‰。但是,1957年的出生率又回升到34.03‰,自然增长率则上升到23.23‰。

#### 四、这次节育高潮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

中国第一次节育高潮,虽然由于诸多原因后来被取消,但是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意义也绝不应因其效果不显而受到贬低。

(一)它是对儒家传统生育观念的有力冲击,是思想的一个解放,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开拓

“广土众民”,“地大国富,人众兵强”及子嗣继承的思想,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直到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仍然极力主张人口增殖,认为如此才能御侮图强,振兴中国。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57年8月31日。

国也都追求人口不断增殖。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人口发展过剩的条件下,这种思想就反映了时代局限性,成了妨碍社会发展的旧观念。

冲破这种观念束缚,实在是不容易的。从节育主张产生,到形成广泛的节育活动,在欧美国家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美国从玛格丽特·桑格夫人提倡节育到家庭计划活动普遍展开,也经历了四十年时间。其中几经曲折,充满着惊心动魄的节育和反节育斗争。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提倡节育是本世纪初的事。但是满清也好,民国、国民党政府也好,对此事一向置之不顾,或予以斥责。吴景超先生1936年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一文中愤慨地抨击当局说:“最不幸的就是反对中国现在采取节制人口政策的人在社会上还握有很大的势力与威权,他们的态度是使中国现在不能用合理的方法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最大障碍”<sup>①</sup>。50多年,除了民间人士建立一二个节育社团和诊所外,几乎没做什么事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五年后,就掀起了颇有声势的节育热潮;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于人口问题的敏感,也反映了敢于向旧的生育观念和习俗挑战的勇气。周恩来总理说,计划生育“是进步的,共产主义的”。节育活动的展开,冲击了愚昧落后的生育习惯,传播了科学避孕知识,使人们在思想解放的路上,向着文明、科学迈进了一大步。

(二)促进了人口科学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的人口学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一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者,接受和引进了欧美的人口学思想,并努力结合中国的情况,尝试着建立中国自己的人口科学。建国后,他们曾一度沉默。自1954年以后,特别是中央提倡节育以后,以马寅初为代表的学者,便满怀热情地致力于人口问题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的人口学做出了贡献。在反右斗争中他们多

遭受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影响是不可泯灭的。新中国人口学研究,起步于50年代,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紧密结合实际,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而做研究,是50年代人口学研究的显著特色。许多学者抓住人口与经济这一对矛盾,从各个侧面进行论述,提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建议。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突出的代表作。他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状况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积累资金、工业原料增长、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粮食增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矛盾,指出了“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解决人口问题的正确途径,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有的学者著文《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建议“一定要在未达到八亿人口以前,先有计划地控制生育,使人口增长速度慢下来。突然地使人口不再增加,或增加很少,这是做不到的”<sup>②</sup>。见解深刻,语义中肯。此期的人口学研究,涉及人口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其广度和深度值得称道,许多著作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关于人口节育,学者们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吴景超教授关于“降低人口出生率,我们可以37%降到17%为目标”和“出生率与生育超过三个孩子的母亲所生婴儿占婴儿总数的百分比有密切的联系”的研究<sup>③</sup>;马寅初关于提倡生2个和生2个孩子有奖,生3个孩子征税,生4个孩子征重税,以税做奖,国家财政不进不出的建议,及控制人口要有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的主张<sup>④</sup>;费孝通关于《人口研究搞些什么》的建议<sup>⑤</sup>;陈达关于

① 《中国节制生育论集》第332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

② 孙本文:“八亿人口是中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载《中国计划生育论集》第163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

③ 《中国计划生育论集》第36~37页,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

④ 同上,第161页。

⑤ 同上,第64页。

晚婚节育的研究<sup>①</sup>，等等，都既有有力的论据，也有深刻的见解，对实际工作很有意义。

有人认为50年代没有什么人口学，似乎我国的人口学研究是80年代才开始的，实在是肤浅的见解。

### （三）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设想

在节育活动蓬勃发展的1957年初，毛泽东同志在多次会议的讲话中，论述了中国的人口和节育问题。他汲取了其他中央领导和一些学者的意见，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设想。这是他人口思想中最光辉的部分。他从“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sup>②</sup>的基本观点出发，既承认人口增多的现实，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又强调人类的自我控制。他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有计划，对于生产自己是没有计划，是无政府主义；他提出，要想一个办法，“有些时候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地生产，这是一种设想”<sup>③</sup>，后来又肯定地提出“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sup>④</sup>。为了实现这个长远的设想，在当前“政府要设一个部门来研究”，“组织人民团体来提倡”，“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sup>⑤</sup>。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说，“人类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强调了计划生育必须依靠群众，动员社会力量。

毛泽东所说的计划生育，并非西方那种家庭范围的计划生育，而是全社会范围的同有计划物质生产相对应的计划生育。这样的计划生育，过去没有人提出过。在一个人口最多，农民占多数，封建意识和小生产观念有广泛影响的国家，使人口生产做到有计划，实在是一个勇气十足的设想。虽然这个主张当时并没有付诸实践，但是这些论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它推动了1957年的节育活动，促进了人口节育思想理论的繁荣。今天

的计划生育，基本上是按照这些设想做的。

当时提出计划生育的并非毛泽东一人。马寅初等学者提出的计划生育的主张和建议，则更具体，更具实践意义。这些思想的汇合，为中国寻找了一条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今天的计划生育的巨大成果，闪烁着前人的思想光辉。

### （四）为后来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年的节育活动，是一个可喜的起步。它不可能对人口出生水平发生多么大的影响。它的价值在于开拓，在于经验的积累。它远不是计划生育，但是它为中国走上计划生育道路闯开了一条路，铺垫了一个台阶。它说明，解决人口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两者必须同步。它的成果不佳说明，像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仅仅象西方那样搞节制生育，是控制不了人口过快增长的；节育活动仅在城市展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理论的讨论，而不把理论体现于具体的政策措施，是没有约束力的；只有社会宣传，没有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是不会奏效的，必须如马寅初所说，“国家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没有强有力的专门领导和管理机构，也是落实不了的。凡此等等，都使后来的计划生育工作少走了许多弯路。

节育活动展开的地方，出现了一批先进典型。其中如山东省利津县、河北省河间县景和乡、山东省文登县望海乡、四川省南充县东观区，山西省高平县米山保健站、北京市平安医院等，都曾经总结过经验，在报纸上报道过。众多的先进典型，不仅提供了工作经验，也都起了火种的作用，使节育之火在更广阔的大地上蔓延开来。

（本文责任编辑：赵天晓）

（作者工作单位：广东省计划生育委员会）

① 同57页③，第330页。

② 《中国计划生育史稿》，第67页，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

③④⑤同上，第68页。